

父亲孙犁有个相处五十年的老朋友,名字也有意思,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名字相对,叫作“李黑”,是搞美术工作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出来的画家。早年我们老家屋子里挂着爷爷、奶奶的画像,就是他给画的。

李伯伯与我父亲相识于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父亲在1987年4月7日曾写过《芸斋小说·杨墨》一文,写的就是他。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父亲从宣化步行十四天回到华北,1947年的时候,李伯伯来到我们家乡,就住在我们家里。经人介绍,

东东的角色

张 跻

东东, 本名袁东, 我新结识的朋友。别人都这么亲热地叫他, 我也就随大流地称其“东东”了。

周日上午, 忽然收到东东的短信, 问我今晚是否有空看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话剧我是喜欢的, 用吴侬软语的对白演话剧, 自然多了一份接地气的亲近, 于是不假思索地回复: “好的, 请给三张。”

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 我如约来到文化广场取票。场外已感演出气氛, 倒票的黄牛撵着纸币四处追逐。东东在东门等我, 一副汗津津的样子, 身着便装, 头发依旧是短短的板刷。我问: “你是此剧的制作? 投资?” 他说: “不是, 只是串个角儿。” “呵, 演员! 演谁?” 我兴奋起来。东东故作神秘: “看了便知, 我马上去化妆, 失陪了。” 我仍未死心, 转面想从其妻小张那儿打探口风。袁太太也是三缄其口, 莞尔而笑。

一家三口步入厅。我低头琢磨着东东今晚的角色: 舞客? 打手? 黑帮老大? 反正顺着跑龙套的角儿狐疑乱猜。正思忖间, 蓦地, 大厅内, 一幅足有十多米长、两米来高的演员群像贴海报赫然在目, 东东竟然位居当中, 摇身一变成了百乐门的“乐经理”: 打着领结, 戴副金丝边眼镜, 双手作揖, 面含微笑, 似乎在向我打招呼呢! 嗨, 这个东东, 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观众席渐渐暗了下来, 灯光聚焦舞台。少顷, 侧台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极好的男士, 我一眼认出就是东东! 只见他朝舞台当中一站, 目光环顾四周, 随后浑厚洪亮的沪语响彻全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朝是1949年的头一日, Happy new year! 在迭额美好辰光, 欢迎大家来到侬百乐门舞厅!” 话毕, 一个有力的手势, 大幕徐徐上升, 在《莫负今宵》音乐伴奏下, 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婀娜摇曳的舞姿闪亮登场, 观众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紧接着, 又是东东的激情一声: “尹雪艳!” 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一代舞后, 一袭银白色旗袍, 款款走来……

在白先勇的原作中, 东东演的这个“乐经理”是不曾有的。然而编导徐俊却巧妙地设计了这个贯穿全剧的人物, 起到调节气氛、增加观赏性的效果, 无疑是点睛之笔。东东对角色的拿捏十分到位, 演得活脱而窃: 一会儿拱手作揖, 迎来送往; 一会儿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八面玲珑满场子的应酬, 一个十里洋场的舞厅掌门人形象跃然舞台。同样, “文革”中接受改造、开放后重新复出的几场戏, 亦可圈可点。

东东的才情是一次结伴远行途中发现的。每到一处, 他便情绪高昂, 诗兴大发, 一首首浓缩人文景观的打油诗脱口而出, 朗朗诵读, 令人顿消旅途劳顿; 更曛的是, 在购物商场, 一条棕黄色披肩往身上随意一裹, 双手合十, 便是一位几可乱真的僧人造型; 花色围裙一兜, 口中一番吆喝, 烤羊肉串的小贩现身了……逗得同伴为之捧腹! 当然, 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东东那手“好男人”的厨艺! 那天从纳斯达克小镇返回利马驻地已近半夜, 定点餐馆的厨师早已回家。望着大家失望的眼神, 东东亲自下厨, 洗、切、炸、炒, 一阵忙碌, 番茄炒蛋, 油条虾仁, 清炒土豆丝……一桌地道的本帮菜展示在眼前, 大家一哄而上, 一扫而光。

袁东毕业于上戏表演系, 按袁太太的说法, 演戏当属他的专业, 而影视广告公司老总的身位才是“业余”的! 然而, 当下之社会, 除了本行, 跨界组合, 角色转换, 已然成了一种时尚与乐趣。一位体坛明星, 没准还是很不错的节目主持人呢!

父亲与李黑伯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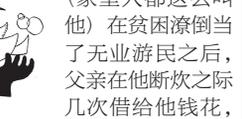
孙晓玲

他娶了一名我们村里的妇女干部。她叫俊英, 人能干, 身材高挑, 长得挺漂亮。他们是在我家西屋结的婚。白天, 楞起爷爷帮着母亲她们几个给擀的面条子, 招待众人。结婚当夜还有村人凑热闹去“听房”, 婶子撺掇她去, 听娘说什么也不去。这事她亲口告诉过我。李伯伯平日喜欢搞泥塑捏泥人, 在《杨墨》一文中父亲有所描述, 而且在文后“芸斋主人曰”中提到了河南淮

阳土产泥虎、泥蛙、泥鸟, 为当地青年所送。父亲“藏之书柜, 珍视如出土文物。并因此忆及老友逸事”。后来父亲把两个身上绘有绚丽图案的泥鸟和七八个黑花泥蛙送给了我, 并夸赞这些民间艺术品做得好。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对其珍惜喜爱程度, 今写此文直觉鼻酸眼胀, 愈感父爱慈晖如春。

1993年父亲住院后, 一天我独自在学湖里为父亲看家, 正在单独干活儿, 突然见李伯伯费力登上楼来, 要看老友如何。他坐在单人木凳上, 关心地询问了病情, 十分牵挂与关心, 未见到老友之面深感遗憾, 喝了杯水便告辞了。他确如父亲所写, “高大如杨” “漆黑如墨” “精神不减” “体胖有加”, 下楼时看他腿有些费劲, 幸好有拐杖助力。父亲住多伦多时他可是经常去, 两人在住房

门口还照了一张相片, 穿一模一样的蓝布制服衣裤, 戴一样的蓝布帽子, 个头儿都在一米八多, 只是胖瘦不一样。看父亲的作品, 我知道了些他俩在解放初期结伴而行逛小市小摊的趣闻, 一个是讨价还价必得白给才甘心, 一个是要多少给多少不会还价。两人一块吃些炸糕煮肠快活无比, 提笼架鸟一直走到马场道干部俱乐部那儿怡然自得。老李黑(家里人都这么叫他)在贫困潦倒当了无业游民之后, 父亲在他断炊之际几次借给他钱花, 几次帮他, 从不歧视他、冷落他, 两人友情甚厚。父亲出院后, 李伯伯的儿子又代父母前来看望。父亲和他说了话, 他也跟我在姐和我唠了家常。他还在姐单借我姐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字, 看来也爱写写画画。那时他好像要出国了。由于儿子的能干与不懈努力, 李伯伯的历史问题得以落实政策, 晚年境遇逆转, 所以父亲称他是一员“福将”。



世界三大男高音中, 卡雷拉斯最不显眼, 三人站在一起演唱, 无论从形象还是飙高音, 他似乎是个配角。但随着欣赏声乐艺术的深入, 我对卡氏越来越入迷, 他的嗓音秀美、优雅、细腻, 音区通透, 韵味迷人, 富有一种贵族般的忧郁美。

四听卡雷拉斯

任海杰

说, 已过了黄金期(何况他还患过白血病), 但他以高超的声乐艺术, 丰富的演唱经验, 独具魅力的舞台表现, 一次次掀起高潮。尤其是多次激情返场(有五、六首), 令那晚的东艺成为沸腾欢乐的海洋。虽然整场音乐会没有一首歌咏叹调, 以艺术歌曲和拿波里民歌为主, 但卡雷拉斯奇迹般的状态还是让乐迷们欣喜不已, 津津乐道。

2007年帕瓦罗蒂去世后, 卡雷拉斯在上海大剧院举办一场纪念音乐会, 依然是上海爱乐乐团伴奏。走进大剧院, 令我惊讶的是, 音乐会用了电声扩音。更令我吃惊的是, 才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卡雷拉斯的头发一下子花白了许多, 神态举止不见了上次那般潇洒。因为电声扩音, 他的真实演唱状态有些“雾里看花”, 这场音乐会更多的是纪念意义。美声演唱用电声, 真还不如回家听唱片。

2011年1月, 听说卡



双栖

(中国画)

朱白云

自从十几岁进中福会儿童学馆以来, 儿童艺术剧场就是我的课堂、我的修炼场、我的战场、我的精神家园, 她提供我丰沛的滋养。1979年, 我的毕业大戏童话歌舞剧《长发姑娘》就是在这里上演。那年我十七岁, 是正式成为一名学馆学生转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该剧取材于民间故事, 在剧中我试演主角长发妹, 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姑娘。那时的剧场舞台有乐池, 几十人的大乐队非常有气势, 对于歌舞剧来说是真正完整的戏剧舞台。现在想来记忆犹新, 仿佛那优美动人的侗家山歌依旧回荡在迤邐的清泉山间。演出后, 我还收到家长来信, 说: “孩子看后, 明白了水的重要性, 它来之不易, 再也不浪费水了。”作为儿童剧演出工作

我最近看的《我们的父辈》是德国三集迷你剧, 单集90分钟。这部剧集, 还有一个译名《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父亲》, 我喜欢这个译名, 直接、亲切, 就像在家里, 近距离地感知着和蔼的父亲、母亲。但剧集, 写的是“二战”, 写的是混乱世界, 写的是血腥、沉痛、悲伤, 写的是德国后代眼中父母那一辈人从地狱走过来的经历, 他们和死亡相伴, 他们的青春年华在战争中消殒颓败。在父辈平和的外表下, 残酷的印痕至今仍深留在他人的身上, 心里。

剧集里的五个人是好友, 他们在一个街区长大, 孩童时就互相了解。哥哥威廉和弟弟弗里德海姆参军, 要向东线开拔; 恋着威廉的夏洛特将在战地医院当护士; 维克多是犹太人, 本想接管父亲的缝纫生意, 在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后, 希望就告破灭; 维克多的女友葛丽塔最大的梦想则是成为一名歌星。五个朋友在小酒馆里道别, 相信再过几个月, 就能在圣诞节相会, 他们留下了一张合影……

关于“二战”题材的影视, 我们看过很多, 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 但德国人拍的这类电影, 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十多年前, 我看过一部《斯大林格勒战役》, 苏联也有一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但两相比较, 就会发现, 后者以全景式的描述见长,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等悉数登场, 战争过程叙述详尽, 而前者则聚焦在几个普通士兵身上, 描写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士兵的生存状态、心理变化, 充满着死寂、绝望、悲凉的气氛, 士兵战死、自杀、饿死、当逃兵, 屡见不鲜, 尤其是电影末尾, 在皑皑白雪中士兵冻死的场景, 具有一种震撼力。

假如说, 《斯大林格勒战役》描绘的只是一场战役, 那么, 《我们的父辈》

时间跨度就有四年, 从1941年到1945年。它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广: 东线战区、战地医院、柏林、游击区。剧集里五个人的命运, 成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缩影。国防军灰猎犬连少尉威廉, 去过波兰和法国, 现在带着弟弟要去进攻苏联, 他以为战争会让人成长。他受命杀害过战俘——苏联政委; 他在一次战斗后, 当了逃兵, 被抓去惩戒营, 战后, 逃回柏林。威廉弟弟弗里德海姆, 一个喜欢兰波和荣格的图书商, 战争初期懦弱、胆怯, 相信战争只会呈现它最坏的一面。渐渐地, 他滥杀无辜, 变得冷血冷酷, 最后, 拒绝投降, 冲向苏军, 被杀。夏洛特只想为祖国尽职, 救护伤员, 但她也会为出卖医院的犹太人而内疚, 会用消极治疗的办法让伤员逃避战争, 会在危急时刻救护苏联女劳工。葛丽塔为了帮助犹太人男友维克多出逃, 为了完成歌星梦而委身党卫队军官, 但因一句“最终胜利没有了”, 散布失败主义论调而被投入监狱, 在纳粹覆灭的最后一刻被处死。维克多在火车上逃脱后, 加入了游击队, 殊不知游击队中也有“反犹太主义者”, 他只能掩藏起真实的身份。

没有概念化、公式化, 没有粉饰、美化, 只有真实的历史图景, 只有平实的叙述语气, 只有德国人真挚的自省和反思。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 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 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苦难。《我们的父辈》里, 当维克多最后走进他们五人四年前相聚的小酒馆, 那里一片狼藉, 钢琴上蒙着灰, 酒瓶上蒙着灰。发黄的合影里, 曾经的灿烂笑容哪去了? 聚会迟到了四年, 不约而同地, 威廉来了, 夏洛特来了, 他们三人久久沉默着, 拿出杯子倒上酒, “还活着, 真好”, 可像弗里德海姆、葛丽塔那样千千万万的人, 却从此告别了世界, 永远地离去了。

我们的父辈

刘伟馨



常, 蜂拥而至, 令这个地处偏远的剧院全场爆满。但当我到了现场, 发现还是用了电扩, 只是音量比大剧院和奔驰中心小, 听上去不太刺耳。此次音乐会最令我感慨的是一句老话: 年龄不饶人。卡雷拉斯不仅头发皆白, 身体明显显老态, 而且走路都有点不太利落。他的嗓音暗了, 高音当然有些吃力, 低音的关闭也有些困难(他以前的低音是多么的细腻美妙呵)。但综观全

藏头一律·为吴宗锡评弹观研讨会而作

胡中行

宗主书坛一马前, 锡常苏沪盛丝弦。
先贤后学峰峦接, 生蒋旦朱珠壁联。
评话惊奇喉内得, 弹词神韵糯中传。
观人论史琵琶里, 好把弘文入馆篇。

场, 不得不承认, 他独特的底蕴还在, 有几处的表现还是出彩的, 要不是无情的年龄, 卡雷拉斯的魅力依然能激动人心的。就像一位迟暮的美人, 依稀可见当年的盛容。再见了, 卡雷拉斯。这回真的是再见的吗?



雷拉斯要到上海奔驰中心开演唱会。我有些犹豫。那个场合肯定要用电声扩音的。但2005年卡雷拉斯在东艺的表现实在太神奇、给人留下了太美好的回忆, 再说, 以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不知以后是否还能听到他的现场音乐会。于是, 我再度光临。也许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对电声尽量“听而不闻”, 再说奔驰中心的电声扩音技术做得比较地道, 音乐会的总体印象倒还不错, 卡雷拉斯的腔调和功力依然在。音乐会散场时, 我想,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现场聆听卡雷拉斯了。

想不到, 今年的5月2日, 大宁剧院开业两周年庆典, 邀请卡雷拉斯开独唱音乐会, 用钢琴伴奏, 不用电扩。这个“利好”消息令乐迷们兴奋异

丰沛的精神家园

蔡金萍

者听到这样的话, 十分欣慰。1984年, 我获得了第一个重要奖项——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红花奖”。当时, 汇演的会场就在儿童艺术剧场, 凡是入围的演员的大照片都醒目地贴在了剧场外墙周围, 比赛的氛围很浓郁, 看到自己的照片, 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那时我参演的角色是《花木兰替父从军》中的花木兰, 一个既柔美、清丽又豪爽、刚烈的角色。老剧场还承办了第一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活动, 我担任了开幕式的主持人, 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1995年, 我出演《雁奴莎莎》主角, 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这也是一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剧

目……等等, 关于儿童艺术剧场的回忆实在太多太多……值得一提的是, 原来在老剧场对面有一家叫做“红榴村”的点心店, 现在应该没有了。那时, 演出界有句俗话说叫“饱吹饿唱”, 因此, 我们常常在演出前不吃东西。演出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 每每演出完后, 我们都早已饥肠辘辘, 这时候就会去对面的“红榴村”叫上一碗馄饨, 吃上几个春卷, 瞬间心情大饱, 还能和观众聊聊天。现在想来仍能回味出那种感动, 美滋滋的。老剧场回忆凝聚情感, 新剧场重生承载梦想。当年的儿童艺术剧场凝聚了几代上海人的成长记忆和情感记忆。今年的“六

十目谈
我与儿童剧场
明起刊登
一组《文史馆春秋》。